

【專號論文】 Feature Article

DOI: 10.6163/TJEAS.201906_16(1).0004

孫中山與中國現代性：
「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思想張力
Sun Yat-s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Paradox between
Democracy and Technocracy[§]

潘光哲

Kuang-che PAN*

關鍵詞：孫中山、中國現代性、「民主實踐」、「專家政治」

Keywords: Sun Yat-sen, Chinese Modernity, Democracy, Technocracy

§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於筆者日文文稿，潘光哲：〈孫文「專門家政治」論と開發志向国としての現代中国国家の起源〉，收入日本孫文研究會（編）：《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ネーションを越えて》，望月直人（譯）（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頁54-71；初稿發表於「東亞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臺北：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2018年10月6-7日）；又，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知識人群體」（計畫編號：MOST-103-2410-H-001-040-MY2）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特致謝悃。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摘要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往往被列入「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之林，國家機關 (state) 在強人威權與專業技術官僚 (technocracy) 領導下，帶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些專業技術官僚得以躍升舞台，實有其錯綜複雜的思想／歷史過程。本文取觀念脈絡 (ideas in context) 之研究手法，論證專業技術官僚的面世，特別與孫中山構思權能區分主張「專家政治」之論述，密不可分，同時也得到知識界的呼應。專業技術官僚的角色，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臺海兩岸，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之間，衝突矛盾，張力無窮；歷時既久，後繼者則無所措意。藉由整體歷史的脈絡進行觀察，對孫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遺產，應可提出更恰當的認識。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Sun Yat-sen's (1866-1925) followers articulate his discourse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ability. In Sun's views, the power over the government indicates that the great power is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People possess a full degree of sovereignty and are able to directly control the affairs of state. The power of governance, correspondingly, is in the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organs. The organs are powerful and are able to manage all nation's business. Sun's discourse can be examined 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the failure in modern democracy. Sun's followers, however, neglect his concern about democratic procedures. Instead, they emphasize the great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organs and interpret it as technocracy.

壹、導論

張知本（1881-1976）在二十世紀中國憲政史上的地位，眾所公認；¹然而，仔細清理他的「憲政想像」（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²孫中山（1866-1925）的學說，其實是張知本的「思想資源」。在張知本看來，「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在政治學說上一個偉大的發明」，其根本精神為「對於一國的政治，把『權』與『能』分開」，使人民有「權」，「一切政治的設施，都要以全國人民的意志為依歸，而政府不敢專制獨斷」，故謂之「全民政治」；孫又主張政府有「能」，「則治理政事的人，便非政治專家不行」，故謂之「專家政治」。張知本本乎「專家政治」之意，更抒發「個人獨創的見解」，認為「軍人的技能是戰術」，要軍人當大總統，便是使之「棄其所『能』，而強為其所不『能』，結果便是一無所『能』」，因此，他主張憲法應該規定「軍人非退職三年後，不得當選為大總統」。³張知本立基於孫中山學說開展的這等「憲政想像」，意義所在，是否引發迴響論爭，並不重要；反倒是他詮釋孫中山的學說，襲用諸如「權能區分」和「專家政治」等等概念，卻是義蘊豐厚，畢竟，返觀孫中山的論說文本，他確曾使用過「五權憲法」和「全民政治」這兩個辭

- 1 張知本與二十世紀中國憲政史之關係，以中村元哉之研究為精要：中村元哉：〈中華民國憲法制定史にみる自由・人權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近きに在りて》，第53號（2008年5月），頁16-28、中村元哉：〈国民党「党治」下の憲法制定活動——張知本と吳経熊の自由・權利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編）：《中華民國の摸索と苦境 1928-1949》（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10年），頁43-80、中村元哉：〈相反する日本憲政觀——美濃部達吉と張知本を中心に〉，收入劉傑、川島真（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日中關係 150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頁171-190、中村元哉：〈世界の憲政潮流と中華民國憲法——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收入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東京：有志舎，2011年），頁225-244。
- 2 憲政想像，意指憲法在為什麼會構成現代政治權威之泉源的脈絡裡，吾人對於思想、文本與行動之間的多重交錯關係，究竟如何認知的方式，從而成就了某個現代政治共同體的憲法，也使得憲法文本得以擁有「創造世界」（world-making）的力量，參照 Martin Loughlin,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78, Iss. 1 (Jan., 2015), pp. 1-25.
- 3 張知本：〈憲法問題：怎樣才是五權憲法〉，《東方雜誌》，第31卷第8期（1934年4月），頁7-15。

彙；⁴「權能區分」和「專家政治」卻不是他本人使用過的概念。⁵相對的，即以「專家政治」一辭而言，⁶那已然是中國知識界同識共曉的「規範詞彙」（the normative vocabulary）；⁷如羅隆基（1896-1965）早在1929年就倡言「只有專家政治，纔能挽救現在的中國」，⁸筆鋒所指，其實乃是方始建立黨國訓政體制的國民黨政府。⁹即使用心方向和羅隆基有如「南轅北轍」，張知本詮釋孫中山的遺辭用語，卻是與時代思潮合拍同調。

這樣說來，在當時的思想氣候裡，即便各種政治力量，各方有心之

-
- 4 「五權憲法」，如孫中山：〈五權憲法（1921年3月20日）〉，《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3年），第2冊，頁412；「全民政治」，如：「〔……〕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1924年4月26日）〉，《三民主義》，收入《國父全集》，第1冊，頁151；一般僅就孫中山自身的文本，討論孫中山的研究，也大抵懷持同樣的觀點，進而敷衍成文，如謂：「〔……〕『權能區分』說乃孫中山先生為解決民主政治的困難，所提出來一套很妥當的安排，其核心價值就在一賦予人民四個政權，以濟代議政體的不足〔……〕成為直接民權、實現全民政治理想。〔……〕在發揮政府效能上，改變歐美民主政治，政府權力分權制衡的矛盾做法〔……〕考試監察二權的獨立運作，更是實現專家政治、萬能政府所特別的安排，讓『權能區分』成為踏實可行的學理〔……〕」，見謝居福：〈孫中山「權能區分」說研究〉，《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7期（2008年4月），頁316。（餘例不詳舉）
- 5 茲舉原文一例：「〔……〕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見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三民主義》，頁136。
- 6 研究討論中國「專家政治」的成果，以鄧麗蘭之研究為精要，參見氏著：《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餘例不詳舉。
- 7 「規範詞彙」借用自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表述，參見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x-xi.（當然，昆廷·斯金納提出「規範詞彙」的論說與他的思想史方法論，密切相關，本文不詳述）。
- 8 羅隆基：〈專家政治〉，《新月》，第2卷第2號（1929年4月10日），後收入《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頁169-184；按，是期《新月》實際出版日行期，因同期刊有胡適〈人權與約法〉一文，撰述時間為1929年5月6日，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第5冊，頁581。再者，羅隆基〈專家政治〉一文收入《人權論集》之版本，與《新月》原刊版本，略有出入；本文引用時，據引文需要，註明出入所在。
- 9 參考劉志強：《中國現代人權論戰：羅隆基人權理論構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士，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所向，出路所趨，自有認知，各有期待，莫衷一是；彼此之間的理念交鋒，匯聚而成的意識形態戰爭，根本上都在這些「規範詞彙」開拓的思想空間裡，相互衝激。然而，「專家政治」這個概念之理論與實踐，在當時的場景裡，即令眾說紛紜，同爭共競；群聲並唱之際，竟爾成為「公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¹⁰歷時既久，傳承繁衍，「專家政治」這個概念之理論與實踐，竟至「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之局，¹¹諸如專業技術官僚（technocracy）、「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概念，已然成為詮釋理解歷史的概念工具，不證自明。¹²就現實言之，當下臺灣海峽兩岸對峙之局，曾無已時；身受專業（科技）技術教育者，大量躍升領導階層，專業技術官僚掌握國政權力，卻是共同現象，至今依然。¹³因此，

10 Sheila Jasanoff 以「公民認識論」這個辭彙來表達那些在特定文化裡，基於政治和歷史而產生的公眾知識方式，並透過一套制度化的實踐，用以測試與布導那些將成為集體選擇的知識訴求（knowledge claims），見 Sheila Jasanoff,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9, 255.

11 「概念延展」借用自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表述，參見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Dec., 1970), pp. 1033-1053；當然，薩托利提出「概念延展」的論說，與比較政治學的概念研究形成之方法論，密切相關，亦引發後繼者之批判，本文不詳述。

12 瞿宛文：〈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4 期（2011 年 9 月），頁 243-288。William C. Kirby, “Engineering China: Birth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1937,”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37-160. J. Megan Greene,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Science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bert Ash and J. Megan Greene (eds.),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pects and Limitations of a Development Mode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Yongmou Liu 劉永謀,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1927-1949,”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43 (Nov., 2015), pp. 75-85.

13 張國暉：〈國族渴望的巨靈——臺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國家發展研究》，第 12 卷第 2 期（2013 年 6 月），頁 73-132、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五南圖書，2010 年），頁 38-43（當然，如其所說，取技術專家治國之途徑研究中共政治，也存在爭論，本文不詳述）、Li Cheng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China Quarterly*, Vol. 121 (Mar., 1990), pp. 1-35. Li Cheng and Lynn T. White III, “China’s Techn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Modern China*, Vol. 17, No. 3 (July, 1991), pp. 342-388.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我們應該超脫既定的歷史認識框架，放寬視野，不以一九四九年為限，¹⁴掌握現代中國／臺灣整體歷史的脈絡，才能更為恰當的理解孫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遺產。¹⁵

貳、國民黨人對「專家政治」的詮解

留學日本，爾後回臺灣擔任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的陳鵬仁（1930-），翻譯日本學界研究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及現代史的成果而蜚聲於世，卻也因為職務的關係，必須扮演孫中山的詮釋者的角色，如他聲言，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之民主政治是全民政治與專家政治，而不是歐洲民主政治的代議政治與階級政治」；¹⁶基本論調，和當年張知本的闡述，沒有太大的差距。

其實，早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三〇年代的國民黨陣營裡，鳴唱同樣音符者，比比皆是，他們注疏申論黨國的意識形態，好似充當了「文化御林軍」的角色。

以國民黨自身創辦的刊物言之。廣州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出版的《前鋒週刊》，即有如生平事跡尚待考索的陳玄夫詮解「專家政治」的意義，即使他未曾特別引據孫中山的言論，全以西方國家致意於「專家政治」，因

14 西村成雄：〈歷史連續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二十一世紀》，第 50 期（1998 年 12 月），頁 39-46。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July, 1990), pp. 121-141. William C. Kirby, "Engineer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in William P. Alford, William Kirby and Kenneth Winston (eds.), *Prospects for the Professions in Chi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283-314. (當然，西村成雄與 William C. Kirby 舉證的面向各有側重，前者強調以創建國民國家 [nation state] 為目標是貫穿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空間的深層底流；後者則注意工程師／專業技術官僚的角色和地位)。

15 如瞿宛文：〈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張國暉：〈國族渴望的巨靈——臺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與 Greene,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Yongmou Liu,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等前行研究，都未注意孫中山學說的相關思想面向。

16 陳鵬仁：《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頁 20。

之能領先於其他國家為理據，倡言：

我們要非專家的政治領袖政治，把瑣細的事體交給專家處理，而自己則專注其結果的優劣。這樣一個有魄力有見解的政治領袖，就可以產生很好的效果了。¹⁷

以國民黨體制的成員言之。像是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代論壇上本來居有一席之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著有貢獻的高一涵（1885-1968），¹⁸當時擔任國民黨政府監察委員，¹⁹倡言現代政治「變成專家政治」之必然，以「政治專門化」、「政治技術化」做為「今日政治的標語」，仍復引據孫中山「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與「國家，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等等述說。²⁰擔任過立法院代理院長的邵元冲（1890-1936），則說孫中山主張「政府要有能」，那麼，「要使政府方面有能，就要使政府方面任何服務人員都有能」，所以「主張專家政治」，理所當然。²¹在臺灣擔任過立法委員的楊幼炯（1901?-1973），早年既以撰述《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黨史》等專著而知名（兩者俱有日譯本），也是孫中山思想的詮釋者，如當孫中山百歲誕辰時，他便有《國父的政治學說》之作，²²同樣也申論孫中山「權能分開的學說，就在實現專家政治」，呼籲「今後政治的革新，是以實現『專家政治』為旨歸」。²³擔任過臺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擔任期間：1962-1972）並長期出

17 陳玄夫：〈論專家政治（上篇）〉，《前鋒雜誌》，第11期（1929年9月23日），頁16-20。

18 參考吳漢全：《高一涵五四時期的政治思想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

19 高一涵於1931年2月16日獲命擔任監察委員，見高大同（編著）：《高一涵先生年譜》（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96。彭勃（主編）：《中華監察執紀執法大典》，第2卷（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頁869。

20 高一涵：〈專家政治〉，《（上海法政學院）法政季刊》，第1卷第1期（1933年），頁1-8。

21 邵元冲：〈政治進化與專家政治〔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建國月刊》，第7卷第1期（1932年），頁1-3。

22 楊幼炯：《國父的政治學說》（臺北：幼獅書店，1965年）。

23 楊幼炯：〈實現專家政治〉，《學術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頁1-3。

任逢甲大學董事長的高信（1905-1993），在一九三〇年代是還未入政界而任教於國民黨黨校中央政治學校的青年教授，依復引據孫中山「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的界定，論證「管理眾人的事」，當然必須「委於具有深究的專門家」。因此，他批判國民黨政府居然「收攬一班『門外漢』來當治黨治國的『專家』」，結果「弄成現在這個失了革命性的黨政府！令熱心的革命青年，只有放聲一哭」。²⁴筆鋒雖然激烈，其用心所至，還是以國民黨必須實現「專家政治」之理想為期望。

身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1887-1975），更需要以對孫中山之詮釋，使他做為「革命接班人」的地位，愈趨正當。²⁵蔣介石教導參加峨嵋軍訓團的學員「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與必須遵奉的中心思想」，乃是「我們總理的遺教」，特別開展詮釋，關於孫中山「五權憲法」部分，他即強調孫中山述說「權與能的分別」之用心，是既讓「人民要有充分的控制政府管理國事的『權』」，又要使「政府要有萬能的治理政事造福全民的『能』」，前者可以「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後者能夠「推進政治，增進效能而實現『專家政治』的理想」，因此「從根本上調和歷史上人民與政府間自由與專制衝突，而建立一個完全為『為民所治』的萬能政府，為全體人民謀最大的福利」。²⁶思考所向，未可跳脫於孫中山擘擬的天地之外。

政治立場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卻未必絕對是黨國訓政體制「文化御林軍」的一般論者，如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的一群教授創辦的《時代公論》（1932年4月1日發刊於南京，1935年3月終刊），²⁷便是如此，其間

24 高信：〈專家政治問題〉，《政治評論》，第4期（1932年），頁15-18。（文末自署撰述時間為1932年6月13日）

25 陸寶千認為，蔣介石之詮釋，仰賴戴季陶之心得甚眾，而與長期親炙孫中山的胡漢民頗有扞格，至胡於1936年逝世，戴季陶之詮釋，「遂定於一」，見陸寶千：〈中國國民黨對總理遺教解釋之確定〉，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上冊，頁22-23。

26 蔣介石：〈國父遺教概要·第二講·政治建設之要義（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峨嵋軍訓團講）〉，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43。

27 關於《時代公論》的組織、言論及政治傾向，可以參考馮峰：《「國難」之際的思想界

吹唱「專家政治」的曲調，亦復熾烈之至。像是署名為「孟」的論者，就將「專家政治」純粹解釋為只是「行政技術」，而與「政治綱領」無關：

〔……〕所謂「專家政治」是指行政技術由專家擔任，不是指政治綱領由專家討論。中國鐵道須從那一條先著手建築，這個問題須召集金融家，產業家以及一般利害關係者共同討論，至於鐵道專家的工程師未必就有討論的資格。不過討論的時候，工程師亦可出席報告經費的多少，以供討論者參考。討論之後，建築設計則非歸工程師擔任不可。〔……〕²⁸

一言蔽之，孫中山營構的「革命政治論述」（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discourse），期可產生說服力量（persuasion）並重行建構政治／社會世界之意義所在，確實涵括簇新的「革命語言」（the revolutionary language）與「政治實踐」（political practice），²⁹確實曾經得以融鑄群體，打造認同。³⁰即如胡適（1891-1962）的觀察，國民黨在孫中山死後，

：1930年代中國政治出路的思想論爭》（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頁41、頁43-47。許小青：〈《時代公論》與抗戰前南北政治文化論爭〉，《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1卷第3期（2011年5月），頁80-87（不過，本文詮解《時代公論》為宣揚權威主義，極大地迎合了蔣介石「一黨獨裁」的需要，參與筆政者也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重用云云，略失公允）；例如，任教於暨南大學等校也參與《時代公論》筆政的沈沛霖（1903-1992）回憶，《時代公論》主編楊公達（1906-1972）就告訴他，是刊言論逾越當局所能容忍的尺度，且成員之間亦有歧見，故爾終刊；而沈沛霖發表於《時代公論》的言論，亦非完全與國民黨（領袖）同調，如他針對蔣介石「攘外須先安內」之宣稱，則聲言「安內必先救黨」，見沈沛霖（口述），沈建中（撰）：《沈沛霖回憶錄》（臺北：獨立作家出版，2015年），頁125-128；覆按《時代公論》，沈沛霖之論說，當為沈清塵：〈中國革命的失敗與其出路〉，《時代公論》，第2卷第45號（1934年2月），頁8-14。

28 孟：〈時事述評：學術界會議與專家政治〉，《時代公論》，第18期（1932年7月29日），頁3-4。

29 相關論說，見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esp. pp. 14-15, 24-25.

30 當然，領導者營構的「革命政治論述」，開發的「革命語言」，倡行的「政治實踐」，未必可以產生其本來預期的效果，即如Orlando Figes和Boris Kolonitskii研究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認為雖應注意「革命語言」對於形塑政治認同和論述的作用，但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就算接受了革命語言，卻也會進行各式各樣的解釋與挪用（appropriation），參見Orlando Figes和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至如其餘類似相關述說，不詳徵引。

依舊「把他的遺教奉作一黨的共同信條，極力宣傳」，立為「共信」，北伐成功的革命歷史，「證明了只要能奉行一個共同的信仰，革命的一切困難都可以征服」。³¹不過，後繼者的再詮釋，遣辭用語必然未可跳脫世眾同識共曉的「規範詞彙」之網羅，對於「專家政治」之詮釋與想望，正是一例。

參、「專家政治」論的呼應流通

倡言「專家政治」的羅隆基，筆鋒矛頭，當然指向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可是，正如他自己的標榜，「只問行政，不管主義」，既然孫中山所言，「政治的目的，是在管理眾人的事」，那麼：

什麼人有管理的知識及能力，我們小民就歡迎誰來管理。「黨治」亦可以，我們先問問談「黨治」的人，是否先能「治黨」。「訓政」亦可以，我們先問問訓練我們的人，他們政治上的知識，是否可以為訓。換言之，我們要問問管理眾人的事的人，是否管理上的專家。³²

同樣倡言「專家政治」的胡適，向約見自己談話的舊友宋子文（1894-1971）³³提出「改革的意見」，就將「充分實行專家政治」，凡是交通、考試、衛生、農礦等部門，「均宜用專家」，做為「改組政府」的原則之一，他更坦白說道：

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

31 胡適：〈知難，行也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8年7月作，1929年5月8日改定），《新月》，第2卷第4號（1929年6月10日），收入《人權論集》，頁162。

32 羅隆基：〈專家政治〉，收入《人權論集》，頁183-184（引文部分，與《新月》原刊版本內容相同）。

33 胡適與宋子文留學時期同任《留美學生季刊》編輯，為他們未來在政治上的密切溝通作了重要鋪墊，見章清：《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66。

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³⁴

可以說，羅隆基與胡適立論的基礎，都不是絕對否定黨國訓政體制的現實。所以，國民黨人以「專家政治」之期望來詮釋孫中山的理論，與它的批判者設定的理想，彼此之間的距離，其實並不那麼遙遠；甚至於可以匯聚合流，軟土深掘，將「專家政治」的觀念，深植厚栽為「公民認識論」的要素，復且傳承相衍，似無終點。即如近二十年後，當翁文灝受命擔任行政院長，胡適的評論還是因為翁「有科學知識與行政經驗」，所以，「希望在他領導下，對專家的政治，得到特別的注意與提倡」，³⁵正是一例。

同是黨國訓政體制的批判者，著重的面向，各有千秋，卻都是「專家政治」的鼓吹者。

胡適聲言，不該將孫中山的一切學說奉為「金科玉律」，如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就是「一班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的護身符」，因為「治國是一件最複雜最繁難又最重要的技術」，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絕對不可能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解決之道，「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³⁶

羅隆基批判的現實是：「中國目前政治上紊亂的狀況，根本的罪孽，是在不懂政治的人，把持國家的政權，不懂行政的人，包辦國家的行政」，遭受「武人政治」與「分贓政治」這兩種「惡勢力」的「夾攻」。所以他主張：「只有正當的選舉和公開的考試，纔能產生真正的專家政治。只有專家政治，纔能挽救現在的中國」。³⁷

較諸基本上「以筆代劍」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胡適與羅隆基，張君勱

34 胡適：〈1929年7月2日日記〉，收入《胡適日記全集》，第5冊，頁657-758。

35 〈胡適評論翁閣「不會叫人失望」希望特別提倡專家政治〉，《大公報》，1948年5月26日，第2版。

36 胡適：〈知難，行也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收入《人權論集》，頁168。

37 羅隆基：〈專家政治〉，收入《人權論集》，頁177、184（引文部分，與《新月》原刊版本內容相同）。

(1887-1968) 與張東蓀 (1887-1973) 則進一步組織政黨：國家社會黨，以謀出路，卻絕不放棄聯合各黨派組合「舉國一致」政府以抗禦外敵的理念。³⁸他們就算曾主張「國民黨以政權還諸國人，退為普通政黨之一」，³⁹不完全承認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獨霸政權，乃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倡言之「修正的民主政治」，還是看重「專門家」的地位：

[……] 我們主張不僅是借重專門家的知識；並且必須使專門家佔有地位，這個地位是不為黨派作用所左右，或政潮所沖動。這樣的主張不僅在於使政務各部都由專門知識來處理；並且亦在於使政務的大部分因為由專家設計，便可比較上成為堅實穩定，不至於時常發生無謂的變化。[……]⁴⁰

張君勱更強調與構想專家的決策者角色。他主張，為實現「集中心力之國家民主政治」，自應組織由公民選舉產生的「國民代表會議」，而且「國民代表會議之議員，宜規定其中之若干成，須具有農工商技術家或科學家之資格」；「關於行政及經濟計畫，除國民代表會議議定大綱外，其詳細計畫由專家議定」，因為「議員中加入專家，行政計畫由專家定之，所以使行政趨於專家化或科學化也」。⁴¹在張君勱 (1887-1969) 他們主辦的刊物：《再生》發表理念的論者，鼓吹的也是同樣的聲調，聲言：「只有把專家在政治上置有相當的地位，否則大規模的建設，例如經濟建設等，決無法實行」。⁴²綜言之，對於張君勱這些在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之外積極參與實際政治活動的人物來說，當他們號召與說服群眾支持一己，從而擴張勢力之際，「專家」的作用與地位，乃是必須列入思考立論的必有之

38 參見薛化元：《民族主義與民主憲政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4）；當然，如薛化元之述說，自國民黨發動北伐以來，張君勱即擬組織政黨以與相抗。

39 張君勱：〈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再生》，第1卷第2期（1933年6月），頁14（文頁）。

40 記者：〈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1932年5月），頁15-16；本文之撰述主要人物究竟為誰，世有爭議，本文不介入討論。

41 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頁30-32（文頁）。

42 吳汝才：〈政黨政治與專家政治〉，《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頁8（文頁）。

義。

既不是黨國訓政體制的批判／競爭敵手，也非「文化御林軍」的一般論者，對「專家政治」之內容與應用，則往往決不質疑其意義，更認為有如他山之石，可供採擇。署名「騰霞」者，始終是《國聞週報》的重要寫手，就是一例，⁴³他發表〈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一文，認為當時國民黨政府標榜以「刷新政治，整頓吏治」為大政方針，確實必要之至，即自美國名史學家Charles A. Beard（1874-1948）主編的*Toward Civilization*一書裡擷取精要，特別是基本上摘譯改寫了是著收錄之L. W. Wallace（1881-？）⁴⁴的“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一文，⁴⁵藉以闡釋「專家政治」為什麼是「近代政治上必然的趨勢」。為了強化立論，他還自做文章，如述說美國國務院的海外領事館，「每月收到國內商人的詢問，平均五千分」，還算忠於原著表述；接下來一句，「騰霞」話鋒一轉，稱譽曰：美國的這些領事「都有商業的專門知識，都受了長久的訓練，故能勝任愉快，美國對於國外貿易如此重視，商業組織如此完密，無怪金元的勢力統治了全世界」。其實，這句話根本就是原著沒有的論說。⁴⁶總言之，「政府統治的工具，厥為組織、技術同科學方法」，如何以這些「工具」來管理眾人之事，「都非專家不能討論執行」。所以「騰霞」呼籲建立起這樣的共識：「政府應切實推行考試制度，選拔真才」，青年應該「務實求學，自能致用」，「全國人民應養成尊崇專家風氣，相信專

43 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國聞週報》，第8卷第6期（1931年2月2日），頁1-6；又，「騰霞」真實身分，至今不詳，其在《國聞週報》刊文多篇，隨意舉例：騰霞：〈蘇俄有計劃生產之經濟組織〉，《國聞週報》，第8卷第30期（1931年8月3日）、騰霞：〈蘇聯第二五年計劃決案〉，《國聞週報》，第9卷第20期（1932年5月23日）、騰霞：〈國難中青年應該怎樣？〉，《國聞週報》，第9卷第37期（1932年9月19日）。

44 L. W. Wallace 全名：Lawrence Wilkerson Wallace，1921至1934年間擔任 American Engineering Council 的 Executive Secretary，見 Lawrence Wilkerson Wallace Papers：<http://www.ecommcode2.com/hover/research/historicalmaterials/other/wallace.htm>，檢索日期：2016年9月30日。

45 L. W. Wallace, “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 in Charles A. Beard (ed.), *Toward Civiliza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0), pp. 176-195；「騰霞」亦自是著收錄之 Lillian M. Gilbreth, “Work and Leisure”一文，介紹工程師（engineer）的界定，見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頁2（原文見 *Toward Civilization*, p. 232）。

46 對比：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頁2，以及 L. W. Wallace, “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 p. 177.

家政治」。⁴⁷「騰霞」的心血與觀念，想來也是《東方雜誌》編者認可的，所以摘錄了他的這篇文章，還加上按語表示能夠「供注意整頓吾國吏治者之借鏡」，⁴⁸期可流傳廣播。

一般報刊之評論，同樣倡言為「專家政治」之理想性，大張旗鼓。一九三一年的《申報》批評說中國「今日之政治，蓋可以一言為斷，曰：『官僚政治』」。任官者「是否有為政之能，為政之才；是否才能稱其職，職能盡其才，非人所問，尤非小民所敢問」。要打破此等局面，只有

從政必以專家〔……〕從政者應各有專長，各有專責。有才必為國用，而國亦必用其才。使從政者各能稱其職，各能盡其能，夫然後庶政盡舉，國家之機能得以靈活而無礙。⁴⁹

因之《申報》的論者呼籲：

黨政領袖能以絕大之努力，下絕大之決心，摧毀官僚政治之根基，厲行專家政治。慎勿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徒令人感喟愴傷於無窮。⁵⁰

約略而言，自從一九三〇年代起，展現於中國言論舞台上的「專家政治」論說，既是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本身，也是這個體制的批判者乃至一般論壇中人，都不會否定的理想追求。從此，在「公民認識論」的天地裡，「專家政治」的價值意義，絕對佔有一席之地。只是，「專家政治」之實踐萬一落空或失敗，又該如何？連自組政治勢力的張君勱與張東蓀在立言之際，似乎都不曾思考要依據「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何等原則，讓「專家」負擔「政治」責任？至於以「專家政治」為至高理想的論者（乃至於被奉為一代民主宗師的胡適），大概都不會設想「專家政治」是否可

47 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頁 5-6。

48 L. W. Wallace：〈美國之專家政治〉，《東方雜誌》，第 28 卷第 3 期（1931 年 2 月 10 日），頁 44-48。

49 〈官僚政治與專家政治〉，《申報》，1931 年 12 月 18 日，第 6 版。

50 〈官僚政治與專家政治〉，《申報》，1931 年 12 月 18 日，第 6 版。

能僅僅會是一場夢幻。「民主實踐」與「專家政治」之間的落差，更在他們的思考之外。

肆、 結論

文化大革命期間死於非命的李平心（1907-1966），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近現代史研究領域裡，應該都佔有一席之地；⁵¹不過，仔細閱讀他的史學著作，其實往往帶有濃烈的戰鬥意味。如他的《中國現代史初稿》（1940），居然闢有一節討論「『專家政治』能夠滿足中國人民的需要嗎？」儼然質疑彷彿為世眾共識咸信的「專家政治」論說，即為一例。

在李平心看來，「要建立一個健全的現代國家，必須要有許多賢能的專家」；然而，「專家政治說」之實際，卻只是「用新式的寡頭政體來代替真正的民主政體」，絕對必須批判，因為「假如民眾不成為國家的本位，只是無條件的信任專家，怎能擔保他們不背叛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須「讓人民發現和選舉自己的治國專家」，更必須「在民眾中間培養和訓練專家」。那麼，「使一切人民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有接受實際政治訓練的平等機會，同時有參加競選和服務國家的平等資格。這就必須用真正人民本位的民主憲政來代替官僚主義的包辦制度或所謂專家政治」，便是應有之義。⁵²質言之，李平心其實不是懷疑「專家」與建立「健全的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期待在「真正人民本位的民主憲政」架構裡落實「專家政治」。

比較李平心的思考與孫中山的關切，旨趣義蘊，基本並無二致。返觀孫中山本來的思路，用今天的話來說，乃是「民主實踐」的關限與其補救方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是：

[……] 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

51 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2005年4月），頁225-233。

52 李平心：《中國現代史初稿》（香港：國泰出版，1940年），頁117-119。

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⁵³

〔……〕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要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治和治權，才可以〔……〕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⁵⁴

就理論上說，「專家政治」與真正「民主實踐」之間，應該存在著這樣的辯證關係：公民能夠有效且盡責地控制政府的決策，而政府能夠充分滿足公民的集體需求。⁵⁵孫中山和李平心的思索主張，意趣庶幾近之。只是，既有的歷史經驗與現實處境卻是「專家政治」與真正的「民主實踐」，背道而馳，水火不容。專家政治，只會是那些僅僅勝任和擅長一個領域的專家的政治；民主則是每一個人依據自我的經驗來參與制定決策，而不是靠什麼技術專長。偏偏在現代社會裡，「眾人之事」的決策，技術色彩越來越凸顯，公民的主權日漸受到侵犯。呼喚民主，擴大民主，意味著希望人們將參與決策視為一己之責任；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下，人們卻益漸失去制定決策的資格，顯明易見。⁵⁶在民主理論的脈絡裡，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對民主的討論，廣受重視，向被認為競爭式民主菁英論（competitive elitism）之宗師，他視民主不過是一種方法與程序，乃是藉由競取人民的票選而獲得決策權力的一種制度安排，選民不能決定議題，也無法支配政治精英的意向，這是現代社會專業化的必然現象。⁵⁷

53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三民主義》，頁136。

54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1924年4月26日）〉，《三民主義》，頁155。

55 Robert A. Dahl and Edward R. Tufte, *Size and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0.

56 參考 Norberto Bobbi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in Lorella Cedroni (ed. & trans.), *Italian Critics of Capitalis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126-127.

57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1-

「民主實踐」瀕於此局，如何補闕彌失，則在關懷之外。在世界脈絡下，孫中山和李平心的主張，其實是對「民主實踐」之問題所在，思索擬構補救方案。

對比之下，現代中國「專家政治」之詮釋與想望，實以犧牲孫中山的本來關懷為代價，僅止側重「專家政治」的一面，對於如何落實真正的「民主實踐」，思考不多。在當下的生活世界裡，描述專業技術官僚得以掌握國政權力的歷史過程，勾勒「發展型國家」概念的歷史進路，固然有助於我們開展歷史的詮釋理解；⁵⁸但是，專業技術官僚、「發展型國家」等等概念，同樣往往對如何落實真正的「民主實踐」，置於九霄雲外，向無關懷，展現「凡存在必合理」的闕限。諸若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成就，強化了東德共產黨的統治，建構成熟共產主義（mature Communism）的正當性（legitimacy）；⁵⁹乃至如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徹底解決」政策，和農藝學家（agronomist）、人口統計學家（demographers）、勞動部署專家（experts in labour deployment）、地理學家等等專業技術官僚提出的「徹底解決經濟體」概念（the concept of an “economy of the Final Solution”），密切相關。⁶⁰凡此諸例，再再深值後人沉吟反思。反省討論專業技術官僚、「發展型國家」等等概念，不能不注意它們應該是由「專家政治」之理論與實踐的「概念延展」的成果，絕非不證自明，它們做為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應該被「歷史化」，予以理

157.

58 即如瞿宛文之獨特詮釋，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發展，與財經官僚密切相關，其實可以將他們視為依復懷持「經世之志」的一群「以實業救國的儒官」，見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研院、聯經出版，2016年），頁284-304。

59 Thomas A. Baylis,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East German Elite: Legitim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Mature Commun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他的論說，問世既早，後來者自有批判，本文不詳論。

60 Götz Aly, “The Planning Intelligentsia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Michael Burleigh (ed.), *Confronting the Nazi Past: New Debates on Moder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p. 140-153；當然，Götz Aly（與懷持相同觀點的學者 Susanne Heim）的詮釋，著述繁多，非僅本文，不詳舉引；且彼等論說，自有異議者，參考 Christopher R. Browning, “German Technocrats, Jewish Labo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A Reply to Götz Aly and Susanne Heim,” *idem.*,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9-76；其間是非高下，自非本文可以措意。

解。⁶¹

本文簡要勾勒孫中山「專家政治」論的流傳廣播的歷史過程，當可顯示，以「脈絡化」的進路，或能更為恰當理解孫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遺產。對關心「孫中山研究」的學界同好而言，本文之作，「野人獻曝」，希望略具這樣的提醒作用。◆

61 清理專業技術官僚（technocracy）、「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概念之論述史，則俟他稿處理。

◆ 責任編輯：郭雨穎

引用書目

- 〈官僚政治與專家政治〉，《申報》，1931年12月18日，第6版。
 “Guanliao Zhengzhi yu Zhuanjia Zhengzhi,” *Shenbao*, Dec., 18, 1931 Sec. 6.
- 〈胡適評論翁閣「不會叫人失望」希望特別提倡專家政治〉，《大公報》，1948年5月26日，第2版。
 “Hu Shin Pinglun Wengge ‘Buhui Jiaoren Shiwang’ Xiwang Tebie Tichang Zhuanjia Zhengzhi,” *Ta Kung Pao*, May 26, 1948, Sec. 2.
- 中村元哉 NAKAMURA, Motoya
 2008 〈中華民國憲法制定史にみる自由・人權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近きに在りて》，第53号（2008年5月），頁16-28。
 “Chūkaminokoku Kenpō Seiteishi ni Miru Jiyū · Jinken to Nashonarizumu——Chō Chi-hon no Kenpōron o Chūshinni——,” *Chikakinariate*, No. 53 (May, 2008), pp. 16-28.
- 2010 〈国民党「党治」下の憲法制定活動——張知本と吳経熊の自由・権利論——〉，收入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華民國の模索と苦境 1928-1949》（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10年），頁43-80。
 “Kokuminty ‘Tōchi’ ka no Kenpō Seitei Katsudō——Chō Chi-hon to Go Kei-yū no Jiyū · Kenriron——,” in Chūōdaigaku Jinmonkagaku Kenkyūjo (eds.), *Chūkaminokoku no Mosaku to Kukyō 1928-1949* (Tokyo: Chūōdaigaku Shuppanbu, 2010), pp. 43-80.
- 2011 〈世界の憲政潮流と中華民國憲法——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收入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東京：有志舎，2011年），頁225-244。
 “Sekai no Kensei Chōryū to Chūkaminokoku Kenpō——Chō Chi-hon no Kenpōron o Chūshinni,” in Murata Yujiro (ed.), *Riberarizumu no Chūgoku* (Tokyo: Yushisha, 2011), pp. 225-244.
- 2013 〈相反する日本憲政観——美濃部達吉と張知本を中心に〉，收入劉傑、川島真（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日中関係150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頁171-190。
 “Sōhansuru Nihon Kenseikan——Minobe Tatsukichi to Chō Chi-hon o Chūshinni,” in Jie Liu & Shin Kawashima (eds.), *Tairitsu to Kyōzon no Rekishi Ninshiki: Nitchūkankei 150ne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13), pp. 171-190.
- 西村成雄 NISHIMURA, Shigeo
 1998 〈歷史連續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二十一世紀》，第

50 期（1998 年 12 月），頁 39-46。

“Lishi Lianxuxing yu Ershishiji Zhongguo de Zhengzhi,” *Ershiyisiji*, No.50 (Dec., 1998), pp. 39-46.

沈清塵 SHEN, Qingchen

1934 〈中國革命的失敗與其出路〉，《時代公論》，第 2 卷第 45 號，（1934 年 2 月 2 日），頁 8-14。

“Zhongguo Geming de Shibai yu qi Chulu,” *Shidai Gonglun*, Vol. 2, No.45 (Feb., 1934), pp.8-14.

沈沛霖（口述）、沈建中（撰） SHEN, Peilin (oral); SHEN, Jianzhong (au.)

2015 《沈沛霖回憶錄》（臺北：獨立作家出版，2015 年）。

Shen Pei-lin Huiyilu (Taipei: Independent Writers Publishing, 2015).

李平心 LEE, Ping-xin

1940 《中國現代史初稿》（香港：國泰出版，1940 年）。

Zhongguo Xiandai Shi Chugao (Hongkong: Guotai Chuban, 1940).

孟 MENG

1932 〈時事述評：學術界會議與專家政治〉，《時代公論》，第 18 期（1932 年 7 月 29 日），頁 3-4。

“Shishi Shuping: Xueshuji Huiyi yu Zhuanjia Zhengzhi,” *Shidai Gonglun*, No. 18 (July, 1932), pp. 3-4.

邵元冲 SHAO, Yuan-chong

1932 〈政治進化與專家政治〔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建國月刊》，第 7 卷第 1 期（1932 年），頁 1-3。

“Zhengzhi Jinhua yu Zhuanjia Zhengzhi [Minguo] Ershiyi Nian Wu Yue Sanshi Ri zai Lifayuan Jinian Zhoujiang,” *Jianguo Yuekan*, Vol. 7, No. 3 (1932), pp. 1-3.

吳汝才 WU, Rucai

1932 〈政黨政治與專家政治〉，《再生》，第 1 卷第 3 期（1932 年 7 月），頁 1-8。

“Zhengdang Zhengzhi yu Zhuanjia Zhengzhi,” *Zaisheng*, Vol. 1, No. 3 (July, 1932), pp. 1-8.

吳漢全 WU, Hanquan

2012 《高一涵五四時期的政治思想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Gao Yihan Wusi Shiqi de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胡適 HU, Shih

1929 〈知難，行也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

- 《新月》，第2卷第4號（1929年6月10日），頁1-8。
 “Zhinsn, Xing ye Buyi——Sun Zhong-shan Xiansheng de ‘Xing Yi Zhi Nan Shuo’ Shuping,” *Xin Yue*, Vol. 2, No. 4 (June, 1929), pp. 1-8.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 HU, Shih (au.); CAO, Baoyang (arrange)
 2004 《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2004年）。
Hu Shih Riji Quanji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04).
- 胡逢祥 HU, Fengxiang
 2005 〈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2005年4月），頁225-233。
 “Li Ping-xin yu Zhongguo Jinxiandaishi Yanjiu,” *Jiangxi Shehui Kexue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4 (Apr., 2005), pp. 225-233.
- 記者 JIZHE
 1932 〈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1932年5月），頁1-60。
 “Women Suoyao Shuo de Hua,” *Zaisheng*, No. 1 (May, 1932), pp. 1-60.
- 高一涵 GAO, Yihan
 1933 〈專家政治〉，《（上海法政學院）法政季刊》，第1卷第1期（1933年），頁1-8。
 “Zhuanjia Zhengzhi,” *Fazheng Jikan (Shanghai Fazheng Xueyuan)*, Vol. 1, No. 1 (1933), pp. 1-8.
- 高信 GAO, Xin
 1932 〈專家政治問題〉，《政治評論》，第4期（1932年6月）。頁15-18。
 “Zhuanjia Zhengzhi Wenti,” *Zhengzhi Pinglun*, No. 4 (June, 1932), pp. 15-18.
- 高大同（編著） GAO, Datong (ed.)
 2011 《高一涵先生年譜》（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
Gao Yihan Xiansheng Nianpu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 秦孝儀（主編） QIN, Xiao-yi (ed.)
 1984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
Xian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Taipei: Zhongguo Kuomintang Zhongyangweiyuanhui Dangshishiliao Bianzuan Weiyuanhui, 1984).

孫中山 SUN, Zhong-shan

- 1973 《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3年）。
Guofu Quanji (Taipei: Zhongguo Kuomintang Dangshi Weiyuanhui, 1973).

陸寶千 LU, Pao-chien

- 1984 〈中國國民黨對總理遺教解釋之確定〉，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5-26。
 “Zhongguo Kuomintang dui Zongli Yijiao Jieshi zhi Queding,” 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ds.), *Kangzhan Qianshinian Guojia Jiansheshi Yantaohui Lunwenji*, Vol. 1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84), pp. 5-26.

章清 CHANG, Qi

- 2012 《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Xueshu yu Shehui: Jindai Zhongguo 'Shehui Zhongxin' de Zhuanyi yu Dushuren Xin de Juese (Taipei: 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2012).

許小青 XU, Xiaoqing

- 2011 〈《時代公論》與抗戰前南北政治文化論爭〉，《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1卷第3期（2011年5月），頁80-87。
 “Shidai Gonglun yu Kangzhan qian Nanbei Zhengzhi Wenhua Lunzheng,”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Edition]*, Vol. 51, No. 3 (May, 2011), pp. 80-87.

張君勱 CHANG, Chun-mai

- 1932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頁1-38。
 “Guojia Minzhu Zhengzhi yu Guojia Shehui Zhuyi,” *Zaisheng*, Vol. 1, No. 2 (June, 1932), pp. 1-38.
- 1933 〈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再生》，第1卷第2期（1933年6月），頁1-15。
 “Kuomintang Dangzheng zhi Xinqilu,” *Zaisheng*, Vol. 1, No. 2 (June, 1933), pp. 1-15.

張知本 CHANG, Zhi-ben

- 1934 〈憲法問題：怎樣才是五權憲法〉，《東方雜誌》，第31卷第8期（1934年4月），頁7-15。
 “Xianfa Wenti: Zenyang Caishi Wuquanxianfa,” *Dongfang Zazhi*,

Vol. 31, No. 8 (Apr., 1934), pp. 7-15.

張國輝 CHANG, Kuo-hui

2013 〈國族渴望的巨靈——台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國家發展研究》，第12卷第2期（2013年6月），頁73-132。

“Guozu Kewang de Juling——Taiwan Kejiguanliao Zhili de Zhongguo Mailuo [The Leviathan That Nationalism Longed for: The Chinese Background of Taiwans Techno],” *Guojia Fazhan Yanjiu [Journ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2, No. 2 (June, 2013), pp. 73-132.

陳玄夫 CHEN, Xuan-fu

1929 〈論專家政治（上篇）〉，《前鋒雜誌》，第11期（1929年9月23日），頁16-20。

“Lun Zhuanjia Zhengzhi (Shang pian),” *Qianfeng Zazhi*, No. 11 (Sep., 1929), pp. 16-20.

陳鵬仁 CHEN, Peng-ren

2000 《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
Sun Zhong-shan Xiansheng Sixiang Chutan (Taipei: Jindai Zhongguo Chubanshe, 2000).

寇健文 KOU, Chien-wen

2010 《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臺北：五南圖書，2010年）。

Zhonggong Jingying Zhengzhi de Yanbian: Zhiduhuayu Quanli Zhuanyi 1978-2010 (Taipei: Wu-Nan Book Inc., 2010).

彭勃（主編） PENG, Bo (ed.)

2002 《中華監察執紀執法大典》（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

Zhonghua Jiancha Zhiji Zhifa Dadian (Beijing: Zhongguo Fangzheng Chubanshe, 2002).

馮峰 FENG, Feng

2007 《「國難」之際的思想界：1930年代中國政治出路的思想論爭》（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Guonan” zhiji de Sixiangjie: 1930 Niandai Zhongguo Zhengzhi Chulu de Sixiang Lunzheng (Xian: Sanqin Chubanshe, 2007).

楊幼炯 YANG, You-jiong

1931 〈實現專家政治〉，《學術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頁1-3。

“Shixian Zhuanjia Zhengzhi,” *Xueshu Yuekan*, Vol. 1, No.1 (1931), pp. 1-3.

1965 《國父的政治學說》（臺北：幼獅書店，1965年）。

Guofu de Zhengzhi Xueshuo (Taipei: Youshi Shudian, 1965).

劉志強 LIU, Zhiqiang

2009 《中國現代人權論戰：羅隆基人權理論構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Zhongguo Xiandai Renquan Lunzhan: Luo Longji Renquan Lilun Goujia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9).

鄧麗蘭 DENG, Lilian

2003 《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Yuwai Guannian yu Bentu Zhengzhi Bianqian: Ershi Shiji Ersanshi Niandai Zhongguo Zhishijie de Zhengzhi Sheji yu Canzheng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薛化元 HSUEH, Hua-yuan

1994 《民族主義與民主憲政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4）。

Minzu Zhuyi yu Minzhu Xianzheng de Bianzheng Fazhan: Chang Jun-mai Sixiang Yanjiu (Taipei: Daohe Chubanshe, 1994).

謝居福 HSIEH, Chu-fu

2008 〈孫中山「權能區分」說研究〉，《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7期（2008年4月），頁287-321。

“Sun Zhong-shan ‘Quanneng Qufen’ Shuo Yanjiu [A Study of Dr. Sun Yat-Sen’s Theory of ‘Division of Authorities’],” *Tainan Keji Daxue Tongshi Jiaoyu Xuekan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o. 7 (Apr., 2008), pp. 287-321.

瞿宛文 CHU, Wan-wen

2011 〈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4期（2011年9月），頁243-288。

“Minzhuhua yu Jingji Fazhan: Taiwan Fazhanxing Guojia de Buchenggong Zhuanxing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Un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84 (Sep., 2011), pp. 243-288.

2017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研院、聯經出版，2017年）。

Taiwan Zhanhou Jingji Fazhan de Yuanqi: Houjin Fazhan de Weihe yu Ruhe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Linking Publishing, 2017).

羅隆基 LUO, Longji

1930 〈專家政治〉，《新月》，第 2 卷第 2 號（1929 年 4 月 10 日），收入《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 年），頁 169-184。

“Zhuanjia Zhengzhi,” *Xinyue*, Vol. 2, No. 2 (Apr., 1929), in *Renquan Lunji* (Shanghai: Xinyue Shudian, 1930), pp. 169-184.

騰霞 TENGXIA

1931a 〈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國聞週報》，第 8 卷第 6 期（1931 年 2 月 2 日），頁 1-6。

“Zhengdun Lizhi Mofan zhi Meiguo Zhuanjia Zhengzhi Zhidu,” *Guowen Zhoubao*, Vol. 8, No. 6 (Feb., 1931), pp. 1-6.

1931b 〈蘇俄有計劃生產之經濟組織〉，《國聞週報》，第 8 卷第 30 期（1931 年 8 月 3 日），頁 1-8。

“Sue Youjihua Shengchan zhi Jingji Zuzhi,” *Guowen Zhoubao*, Vol. 8, No. 30 (Aug., 1931), pp. 1-8.

1932a 〈蘇聯第二五年計劃決案〉，《國聞週報》，第 9 卷第 20 期（1932 年 5 月 23 日），頁 1-5。

“Sulian Dier Wunian Jihua Juean,” *Guowen Zhoubao*, Vol. 9, No. 20 (May, 1932), pp. 1-5.

1932b 〈國難中青年應該怎樣？〉，《國聞週報》，第 9 卷第 37 期（1932 年 9 月 19 日），頁 1-5。

“Guonan Zhong Qingnian Yinggai Zenyang ?,” *Guowen Zhoubao*, Vol. 9, No. 37 (Sep., 1932), pp. 1-5.

ALY, Götz

1996 “The Planning Intelligentsia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Michael Burleigh (ed.), *Confronting the Nazi Past: New Debates on Moder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ANDREAS, Joel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SH, Robert & GREENE, J. Megan (eds.)

2007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pects and Limitations of a Development Mode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BAYLIS, Thomas

1974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East German Elite: Legitim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Mature Commun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BOBBIO, Norberto

2010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in Lorella Cedroni (ed

- & trans), *Italian Critics of Capitalis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121-138.
- BROWNING, Christopher R.
1992 "German Technocrats, Jewish Labo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A Reply to Götz Aly and Susanne Heim," *idem.*,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9-76.
- CHENG, Li & WHITE III, Lynn T.
1990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121 (Mar., 1990), pp. 1-35.
1991 "China's Techn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Modern China*, Vol. 17, No. 3 (July, 1991), pp. 342-388.
- DAHL, Robert A. & R. TUFTE, Edward
1973 *Size and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FIGES, Orlando & KOLONITSKII, Boris
1999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REENE, J. Megan
2008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Science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HELD, David
2006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UNT, Lynn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JASANOFF, Sheila
2005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IRBY, William C.
199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July, 1990), pp. 121-141.
2000 "Engineering China: Birth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1937,"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41-152.
2011 "Engineer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in William P. Alford,

William Kirby & Kenneth Winston (eds.), *Prospects for the Professions in Chi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283-314.

LOUGHLIN, Martin

2015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78, Iss. 1 (Jan., 2015), pp. 1-25.

LIU, Yongmou 劉永謀

2015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1927-1949,”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43 (Nov., 2015), pp. 75-85.

SARTORI, Giovanni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Dec., 1970), pp. 1033-1053.

SKINNER, Quentin

1985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WALLACE, L. W.

1930 “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 in Charles A. Beard (ed.), *Toward Civiliza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0), pp. 176-195.

1931 〈美國之專家政治〉，《東方雜誌》，第 28 卷第 3 期（1931 年 2 月 10 日），頁 44-48。

“Meiguo zhi Zhuanjia Zhengzhi,” *Dong fang Zazhi*, Vol. 28, No. 3 (Feb., 1931), pp. 44-48.

LAWRENCE Wilkerson Wallace Papers

<http://www.ecommcode2.com/hover/research/historicalmaterials/other/wallace.htm>，檢索日期：2016 年 9 月 30 日。